



世纪文库

中国文字学

唐兰 撰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国文字学

唐兰 撰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字学 / 唐兰撰.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4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5325-3903-2

I. 中... II. 唐... III. 汉字-文字学 IV. 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02481号

责任编辑 黄晓峰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中国文字学

唐兰 撰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mm 1/16

印张 11.5

插页 4

字数 160 000

版次 2005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5-3903-2/I · 1741

定价 21.00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中国文字学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导 读

一

唐兰 (1901—1979)，字景兰，号立庵，浙江嘉兴秀水县人。早年入商业学校，后改学中医。1920年至1923年，就学于江苏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事唐文治先生，由是发愤治小学，渐及群经。1924年在无锡任中学国文教员，开始从事《说文解字》和古文字研究。唐兰先生对清代学者孙诒让的学识至为钦佩，服膺孙氏的偏旁分析法，故其考释古文字，从分析偏旁入手，重理据，戒臆断，精密过于前人。他曾对罗振玉考释甲骨文屡有订正，颇受罗氏的赏识，并被介绍给王国维。王氏对他也极为器重，赞誉之情溢于言表：“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殷墟书契类编》序）1925年，因罗氏之引荐，设馆寓居于天津建德周氏，曾编辑《将来月刊》与《商报文学周刊》，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古史研究。1931年春，赴沈阳同金毓黻先生编纂《辽海丛书》，同时任教于东北大学中文系，讲授《尚书》。

“九·一八”事变后，辞退返京，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尚书》、《诗经》、“三礼”与古文字学。“七·七事变”后，离京经香港、河内，抵达昆明，于1940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导师。1946年，受聘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并于次年任中文系代理主任。1951年调北京故宫博物院工作，曾任研究员、陈列部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及副院长等职。1954年，应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曾被下放到湖北劳改农场。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其中有《周易》、《老子》等十余种古籍十二万余字，被派往参加帛书整理工作。在帛书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后，为了完成研究计划，已重病缠身的他仍然夜以继日地不停写作。1979年1月11日，与世长辞。享年79岁。

唐兰先生学识渊博，兴趣广泛，经学、文学、史学、金石考古、文字、音韵、训诂、诗词歌赋，无一不通。当然，在这诸多学术领域中，其致力最久、贡献最大的，还是古文字学与金石考古，其主要著作有《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天壤阁甲骨文存》、《中国文字学》以及未竟之作《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等，论文有《古乐器小记》、《永孟铭文解释》、《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等共一百余篇，1995年由故宫博物院编辑的《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就辑录了45篇重要论文。其他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敦煌所出汉人书太史公记残简跋》、《敦煌石室本唐写郑注论语颜渊、子路两篇残卷跋》、《敦煌石室本唐人选唐诗跋》、《唐写本食疗本草残卷跋》、《切韵中所见隋唐以前韵母考》、《郑庠的古韵学说》、《论古无复辅音，凡来母字古读如泥母》、《论唐末以前韵学家所谓“轻重”与“清浊”》、《石鼓之年代考》、《陈常陶釜考》、《周殷地理考》、《昆仑所在考》、《老子时代考》、《白石道人歌曲旁谱考》、《敦煌所出唐人杂曲》、《试论顾恺之的绘画》、《黄帝四经初探》、《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

篇》考》，等等。

二

《中国文字学》是一部用新的观点系统地研究汉字字形的理论性专著，是作者继《古文字学导论》之后又一部研究中国文字学的重要著作。两书虽然各有侧重，但彼此的联系甚密，所以，两书合看，能够更好地了解唐兰先生关于文字学的理论及其在中国文字学史上的贡献。为此，在这里，我们对《古文字学导论》先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古文字学导论》最早的手写石印本，由北京大学于1935年出版，是唐兰先生早年在对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与小篆以及先秦典籍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之后，系统地阐述古文字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一部力作，共分上、下两编。论述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确定古文字学的范围并叙述其历史；二、由最近研究古文字的所得推论汉字的构成和形体的演变，纠正旧时文字学上的错误，并建立新的理论；三、阐明研究古文字的方法和规律。

古文字学的范围有多大，这是关系到古文字学研究对象和性质的首要问题。唐兰先生认为，由文字学的眼光来看，小篆是古文字中的最后一种。小篆以前的文字，虽然有很多变革，但在小篆里还能看到一些象形、象意的遗痕，与古文字同一系统。这一论断是符合文字系统的实际情况的，这就纠正了当时一般人以为古文字只限于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的错误看法。这对明确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建立新的古文字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文字材料的类别和来源，也是古文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材料分类上，唐兰先生剖析了通常用器物来分类的方法的弊病，从文字学的观点出发，着眼于时代和地域的区分，提出新的分类方法，把已发现的材料分为殷商系文字、两周系文字、六国系文字和秦系文字。

他将古文字材料的来源分为两类：一是古书，二是古器物。他指出，古文字的研究应以古器物作主要对象。所有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

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唐兰先生认为，文字起源于绘画，到统一国家出现后，跟语言结合，就产生了可诵读的真正文字，文字的产生是自然趋势，并非一两个人所创造。关于中国文字产生的时代，在该书中，唐兰先生认为象形文字至少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象形、象意文字的完备至迟也在五六千年以前，形声文字至迟在三千五百年前。对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唐兰先生分为三期：原始期、上古期、近古期。由上古到近古，由绘画转到注音，是文字发展中的绝大变革。对形声字的产生，唐兰先生论述得最为精辟。他说：“文字的演变，有三条大路：形的分化，义的引申和声的假借。上古期文字分化的结果，使文字渐渐声音化，后世人们加以‘归纳’，就创始了注音的方法，于是就假借来的私名注上形符，有时就拿音符来注形符，这是‘转注’。至于引申来的语言，本不一定需要形符，后来也颇有‘增益’。归纳、转注、增益，这是形声字产生的三条路径。”

在汉字构成问题上，唐兰先生一反传统的“六书”观念，在该书中明确提出了“三书说”。他指出，传统的“六书说”理论非常粗疏，郑众、班固仅有“六书”之名，许慎也只有极简要的解释，且名称与次序不一，既不精密，又不清晰。他把中国的古文字分析为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和形声文字三种，名为“三书”。这种分类能够尽赅一切汉字，较传统的“六书”确切而严密。

书中以大量的篇幅阐述“怎样去认识古文字”，特别强调在释字之前必须把字迹的形体笔划搞清楚。在搞清字体笔划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四种认识古文字的方法，即对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其中，前两种是过去学者经常使用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偏旁分析法为清人孙诒让所建立，唐兰先生又在其基础上加以充实和完善。特别是将偏旁分析与历史考证结合使用，先把认识的古文字中所用偏旁，按照单体独立分解出来，然后把各个单体偏旁的不同特点分别

开来，研究它们的发展变化，在考证不同时期偏旁变化的基础上，再来辨识每个文字。唐兰先生认为，单个的识字，犹如手工劳动，而用偏旁分析，则好比机器在生产，用这种方法整理甲骨文，能使可识之字比一般的估计增加一倍。这种方法一经发布，即为当时大多数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们所采用，现在已成为考释古文字最为有效的科学方法。

《古文字学导论》在中国文字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81年，齐鲁书社出版该书的增订影印本，张政烺在《出版附记》中如此评价这部著作：“中国古文字研究已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但很少理论性的著作，唐兰同志这部书是空前的，在今天仍很有用。”

三

《中国文字学》的问世比《古文字学导论》晚了14年（1949年开明书店出版），因此，在该书中，唐兰先生的文字学理论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如大家所见，《中国文字学》全书共三十节，分属五大部分：“前论”部分，从语言学以及世界各区域文字的宏观视野，阐述中国文字学的范围及新领域，评述了中国文字学的发展过程；“文字的产生”部分，首先推测中国原始语言概貌，然后剖析了关于中国文字产生的种种传说，追溯了汉字的起源；“文字的构成”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之所在，在该部分，唐兰先生批判了延续二千多年的传统的“六书”说，深入细致地阐发了他的“三书”说；“文字的演化”部分，作者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汉字演化的原因与过程，并且明确指出：“不懂得‘演化’，就不能研究文字学，尤其是中国文字学”；“文字的变革”部分，对汉字从古文字、大篆、小篆到隶书、草书、行书、正书甚至简俗字、新文字等的发展变化，作了详细而系统的论述。

《中国文字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确立了中国文字学的名义，明确了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对象。

唐兰先生指出，虽然“中国人对文字的研究，远在纪元前几个世纪已经开始”，但两千多年来却只是延用了一个是而非的名称——小学，一直到清末，章太炎等才把“小学”叫作“文字学”。“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科学，在一个中国人看来，这个名词是很恰当的。但由西方输入的科学名词，还没有一个可以配合的名称”，“因为中国的文字是特殊的，在一切进化的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时期，她却独自应用一种本来含有义符的注音文字”，“所以，这一种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殊的学科，我们只有把它叫做‘中国文字学’（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这就给中国文字学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地位。在一切以西方的语言学理论为主臬的时代，作者却能从中国文字的特殊性出发，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主张文字学应该独立于音韵、训诂之外，成为一门以文字形体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因为传统的“小学”的名称，内涵十分含混，其研究对象往往包括字形、字义和字音三个方面，甚至清末以来的文字学，也总是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但是，“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因此，“我的文字学研究对象，只限于形体，我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实际上，还得把训诂学送出去。”“文字学把训诂、音韵两部分除去以后，一般人总以为它的范围要缩小了，实际上并不如此。”的确，在只以许慎《说文解字》所提供的小篆与“六书”理论及少量的传世文献所提供的文字形体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看来，如果把训诂、音韵从文字学中分离出去，范围是缩小了。但是，唐兰先生把眼光放在整个中国文字发展史，文字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张，甲骨文、铜器铭文、陶文、玺文、货布文、简牍帛书以及隶书、草书、楷书等，都成了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所有这一切，对中国文字学的新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批判了“中国语言低级、文字原始”的错误观点，确立了中国语言、文字在世界语言、文字史上的地位。

唐兰先生指出：“有些人把文字进化分做四个阶段：一、图画字；二、义符字；三、声符字；四、字母。他们以为中国人跟埃及人、苏马利亚人、巴比伦人一样，只改良到第三阶段就停止了。他们说中国人没有用字母，所以在原始时期上停留了二千年，文字的繁难，形成了中国文化进步的阻碍。这种错误的观察者，他们不知道文化不会停留在哪一点上的。远在纪元以前，中国人就懂得合音，后来发明反语，把声和韵分开，这种发明，将有一千八百年。在这时期，中国曾经有过璀璨的文化，使她的邻邦高丽、日本、安南等，都采用了她的文字。可见中国文字足够适应那时的需要，它能一直应用到现在，一定有它本身的价值。指摘中国文字的人，同时也往往指摘中国语言，像单音节、没有语尾、没有形式变化等，认为是低级的语言，可是现在的语言学家大都已不这样想了。中国文字的变为注音文字，而不变为拼音文字，显然和她的语言有关。一个字既然是一个音节，有一千多个声音符号，就可以把这个民族的语言通统写出来，又何须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中国文字没有发展为拼音的，而只是注音的……它能代表古今南北无数的语言，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中国文字不仅是由古代图画文字变成近代文字的唯一的重要材料，也是在拼音文字外另一种有价值的文字，是研究文字学的人所应当特别注意的。”

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早期，由于国力衰微，许多仁人志士纷纷到西方寻求强国之道，西方的哲学思想、学术思想使沉寂的中华大地如沐春风。但是，不顾国情，一味套用西方的哲学思想、学术思想，就难免会陷入机械主义的泥潭。在语言学、文字学界，中国语言落后论、中国文字原始论，在二十世纪初，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同看法，似乎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中国的语言是低级的，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字是原始的，所以汉字也必须走拼音化的道路。实际上，当一种语言能够用最简练的方式表达如此丰富的情感、表达如此深邃的思

想，这恰恰表明，这种语言是最高级的。特别是当有那么多快捷而便利的汉字输入法问世以后，汉字原始论也早已不攻自破。汉字不仅能够适应中国的过去，也将完全能够胜任未来发达社会的需求。唐兰先生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为流俗所移，确是非常不容易。

第三，解决了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

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唐兰先生认为，所谓仓颉作书及文字起源于结绳或八卦的传说，都是不可靠的，最初的文字决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众人的创造。他推许《易·系辞》的说法：“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也就是说，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有过结绳记事的时代，但那与文字无关，后来才有了文字，一个“易”字，恰好说明了这种关系。最初的文字是“书契”，“书”由图画发展而来，“契”由记号发展而来；绝大多数文字起源于图画。至于八卦，唐兰先生认为，其起源是用算筹来布成交，用来做事物的象征，和文字无关，况且其起源要比文字的产生晚得多，因此，“八卦的卦画，决不是文字所取材的”。

在书中，作者对文字的产生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

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但是绘画只能描写印象，表现自然，不能完全表现出作者思想和感情，所以不是文字。经过很长的时期，人类由渔猎社会，进入了农业社会，有了相当安定的居处，由小的部落积累成国家，有了剧烈的战争，交通一天一天地繁复起来，许多歧异的语言混合起来，有了较普通广泛的语言。在这个时候，有人画出一只老虎，任何人见了都会叫做“虎”，画出一只象，任何人见了都会说“象”，有了图画，加上了统一的语言，如其那时的文化已经发展到那种需要，就立刻有了文字。

关于文字产生的时代，唐兰先生从文字本身和历法发明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推断中国文字的发生，总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文字已经很发达了”。

第四，进一步批评传统的“六书”说，论述所创立的“三书”说。

在文字构成问题上，唐兰先生指出，传统的“六书”说，自郑众、班固提出的“六书”名目后，到许慎才建立了义例，“六书”说才得以成立。有人误解“六书”是仓颉造字的六种法则，也即造字的最原始的法则。其实，“六书只是秦汉间人对于文字构造的一种看法”，而不是在造字之初就有人先确定造字的原则，然后根据这些原则去创造一个一个字。

即便是许慎给予“六书”的界说，也因其过于简单而不能确定，“在义例上已有很多漏洞，在实用时，界限更难清晰”，“所举的例，每一条又只有两个字，所以后来人的解释，人各一词。六书之学，简直可以汗马牛、充栋宇”。如在“会意”下，许氏所举的例子是“武”、“信”。唐兰先生说：“‘止戈为武’，见于《左传》，‘人言为信’，见于《穀梁》，似乎是很有根据的。但从现在的眼光看，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古文字只有象意，没有会意。象意字是从图画里可以看出它的意义的。‘武’字在古文字里本是表示有人荷戈行走，从戈行的图画，可以生出‘威武’的意义，从足形的图画里，又可以看出‘步武’的意义，可是总不会有‘止戈’的意义。至于‘信’字，只能是从言人声的一个形声字。”在讨论“转注”时，作者认为“转注是问题最多的一个名目……‘同意相受’是容易解释的。‘建类一首’却很麻烦”，“有些人把释诂来解释转注，忽略了字形，以为建类一首不是部首……有人以为‘考’跟‘老’只有声音的关系，有人以为‘考’跟‘老’只是互训的关系。总之，这条界说不清楚，例子也不好，所以愈讨论愈糊涂”。许氏所说的“假借”，“解释得很好，可惜他把例举错了。他所举‘令长’二字，只是意义的‘引申’，决不是

声音的‘假借’”。

唐兰先生认为，“六书”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各人可有各人的说法。其次，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秦汉间人“那时所看见的古文字材料，最早只是春秋以后，现在所看见的商周文字，却要早上一千年，而且古器物文字材料的丰富，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没有的，为什么我们不去自己寻找更合适更精密的理论，而一定要沿袭秦汉时人留下来的旧工具呢？”

唐兰先生在否定“六书”说的基础上，再一次提出了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已经建立的“象形”、“象意”、“形声”“三书”说。他说：“象形、象意文字是上古期的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期的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只要把每一类的界限、特征弄清楚了，不论谁去分析，都可以有同样的结果”。

他所界定的象形字又叫做“名”，名和实一定符合。它包含这样三个条件：一、一定是独体字；二、一定是名词；三、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别的意思。“例如古‘人’字象侧面的人形，一望而知它所代表的就是语言里的‘人’，所以是象形字。古‘大’字是象大人的意义，虽则象正面的人形，但是语言里的‘大’，和人形无关。我们可以推想，古‘大’字是象大人的意义，因为小孩子总是头大，身体的比例小，而大人则身体的比例大了，头反觉得小了，所以，大人的‘大’是由小子之‘小’，比例得来的。由大人的‘大’，又引申做一般的‘大’，这个字已包含了人体以外的意义，那就只是象意字。”

他所界定的象意字又叫做“文”。它代表语言中意义复杂抽象的词或表现人、物之间关系或动作形态的词。象意文字也是图画文字，它有时是单体的，有时是复体的。单体象意文字有些近似象形文字，不过象意字注重的是一个图形里的特点，如“身”字象人怀孕大腹形，就只注重大腹的一点，此外可以不管；复体象意字有些近似形声文字，